

# 明清时期云南的中医药瘟疫防控(上)

□ 杨祝庆

自明初开始,大批军队和移民不断进入云南,戍边屯田,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军医、民医、医官等医药人才。根据历史资料对比分析,明清两代500多年是云南疫情高发期。云南各族人民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也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中原的医药理论和技术,吸收云南各民族医药经验,形成了具有云南特点的中医药技术和医药文化,在云南医药史上出现了一个高峰,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医药著作,如明代刘寅的《伤寒脉赋》、兰茂的《滇南本草》和《医门揽要》,清代管淦的《管淦秘方》、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姚文藻的《痘疹经验录》、李本修的《瘟疫集要》、奚毓崧的《伤寒逆论》、曹鸿举注的《瘟疫论》和《瘟疫条辨》等。这些著作,对瘟疫等传染病防治作了精辟分析,是明清至近代云南中医防控瘟疫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实践验证。

## 古人应对瘟疫的方法

从古到今,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和应对方法,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从来没有一次到位的认识。有些古代应对瘟疫的方法已经消失了,但今天的人们没有理由用后来的科学进步去要求古人,更没有理由嘲笑前人的探索。今天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实践积累。明清时期云南应对瘟疫,有一些普遍使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十分独特。

**炉烟瘴疔法。**明代医药学家兰茂在《滇南本草》中,记载炉烟瘴疔法。明代,防治瘴疔(又称瘴气、瘴疫、疟疾等)的办法是支起火炉,烧出烟雾,以熏驱瘴气。其实,烟熏瘴气的方法由来已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救时疾。”古代设置专门掌管用火法疫的官吏“司燿”,负责动员民众,利用火来烧燎防疫。《周礼·秋官》记载,当时还设有鬲氏与庶氏等官职,他们使用莽草、嘉草等来烧熏驱虫。在当时条件下,“炉烟瘴疔”之法是驱赶蚊蝇和隔离技术的艰难探索。面对灾难,先民们奋起抗争,绝不屈服,这种斗志正是战胜病魔的力量来源。

在云南明代的医药条件局限之下,燃烧烟雾驱赶蚊虫,阻断病菌传播渠道,是可行的方法。据史料记载,用烟熏防治疟疾传播的举动,根据疫情持续时间,有时可持续一年或更久。以烟治瘴的方法,一直流传下来,据民间调查,到20世纪60年代昆明杨林、寻甸一带农村仍在使用这一方法。盛夏黄昏,蚊蝇漫天飞舞,村民用诸葛草在堂屋里燃起火堆,烟雾弥漫整个屋子,以驱逐蚊蝇。各地燃烟所用材料不一,多采自本地的艾蒿、黄草、青蒿、膏滋、香蒿等植物,平时晒干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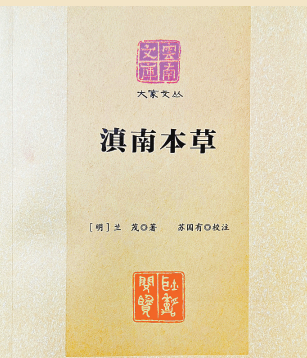
1844年日本汇集张仲景医方的《伤寒杂病类方》封面



[明]兰茂《滇南本草》1914年版扉页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书影



201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文库·大家丛书》中的校注本《滇南本草》(附《医门揽要》)



济世救人(兰茂纪念馆藏)

**培养正气,补脾截疟。**兰茂《医门揽要》是《滇南本草》的姊妹篇,它对云南地方病、常见病和传染病,提出了具体而独到的治疗方案,从中可窥见明清时期云南防疫疟疾、霍乱、痢疾等重大传染病的方法和思路。《医门揽要》说:疟疾“如面色青黄者,补中汤加首乌、鳖甲、常山、苹果、广子(槟榔子)、姜枣治之”。这一治疗方法,继承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截疟七宝饮”的处方。常山为落叶灌木,属于虎耳草科植物,一直是中医治疟专药。《医门揽要》对古方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它以“截疟七宝饮”来催吐,同时用补中汤来补益脾胃,巩固根本,治标却不忘治本。培补正气是兰茂用药的显著特点,他告诫说:“养正则邪气自除”。这一观点,与当代增强身体免疫力抵抗疾病

酒,作个体消毒。这些习俗,都反映了古代人民防疫治病的特点。

**用水酒服药。**古代的发酵酒,在传统中医药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南本草》记载用水酒服药防治瘴气的经验:“元江瘴气,用刺梨皮晒干为末,于临发时以水酒度下”;“临安瘴气,用野菜菰根水酒煎服”,把一些中草药晒干研捣成粉末,用水酒度下,作为预防用药。明代兰茂将酒用来作为防疫的辅助用药,沿袭了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防疫经验。

酒,作个体消毒。这些习俗,都反映了古代人民防疫治病的特点。

病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

## 具有创见的医药理论

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主流中医药理论传入云南后,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期实践和著名医药家的诊治探索 and 理论总结,与云南气候、地理、物产、习俗相结合,产生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应对瘟疫方法。兰茂《医门揽要》中说:中暑(包括后世所称的霍乱、痢疾、伤寒等疾病)“此症北省夏秋始有,滇省季节不真,四时俱有,轻为霍乱,重即绞肠痧(千霍乱)”。由于云南四季不分明,常年都有中暑病人,轻的为霍乱,上吐下泻;重的为绞肠痧,肚腹扭疼,欲吐不能,欲泻不能。因此,在治疗上,不能拘泥于前验。兰茂指出:对云南的霍乱、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不可过表,亦不可过里、宜和解之”,不可过分发汗,也不可大剂量攻下,应当和解表里。即要防止错误地攻下而变成痢疾,也要防止错误地发汗,致使体液虚脱而变成伤寒。对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医门揽要》专列一节“中暑合症”,并列了解表里的“中暑附方”,兰茂的这一理论,实为云南明清时期的治疗方案和操作指南。

兰茂在继承传统用药理论的同时,又能根据云南特点加以变通。例如,《医门揽要》所用小柴胡汤,与汉代张仲景

《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不同。兰茂说,云南“天偶阴即冷,人冒之即为寒感症”,在滇中地区“遇雨便成冬”这一气候特点影响下,云南春季时常暴发的一些传染病,除具有内地常见的主要症状外,还常出现云南本地特有的一些症状,须要辩证施治。兰茂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感寒”的概念,指明“感寒独伤于阴”(不伤于阳),揭示了本地特有症状的病因。据此,在治疗方法上,兰茂提出“感寒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阳)”。就是说,内地的伤寒或疟疾,可发汗解表,而云南的伤寒或疟疾,不能发汗解表,应温补于内,重在补阴。

兰茂在《医门揽要》中,创制了专用于云南本地的小柴胡汤。该方保留了《伤寒论》小柴胡汤合解表里的制方之旨,又将人参改为沙参,以补阴;加入云南常见的葛根,疏散风热;减去大枣,增加陈皮,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经过兰茂加减后的小柴胡汤,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最终使患者气血平衡,恢复如初。

兰茂创立的“感寒”理论及其对治方法,在几百年中为医家所珍视,并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今云南特产中成药“参苓健脾胃颗粒”,很好地传承了兰茂的医学思想。

(作者单位: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 石羊古镇:纪念馆领略大姚红色文化

□ 本报记者 李悦春 文/图

一个明媚的春日,我们走进大姚县石羊古镇,在一幢古老的中式建筑前驻足——深红色的格子门,雕花的窗棂,经过翻修后的白墙灰瓦,这是焕然一新的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

大姚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土地。1926年,大姚人赵祚传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六军团长征过大姚,播下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地下组织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7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下,大姚地区爆发反蒋武装斗争;1949年,中共滇西工委在大姚成立“三姚支部”;1949年12月18日,大姚获得解放。为了纪念大姚的革命先烈和红军长征过大姚的光辉事迹,大姚县投资200万元重建了红色文化纪念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记录大姚党组织的革命历程、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以及共产党员的高尚精神。这个纪念馆如今已成为大姚县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

## 先烈气节

在纪念馆前厅,映入眼帘的几张照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德三,英俊的脸庞上透着坚毅;赵祚传,年轻而充满朝气;还有刘执之、赵贯一、王子近、高梁、封于齐等,他们是大姚的早期共产党员或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人。

云南祥云人王德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接受党组织派遣回云南领导革命工作,在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后,任书记。1930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省

委,王德三任书记。1930年12月31日,王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

高梁是世界名曲《小河淌水》原曲《大田栽秧秧连秧》的作者,该曲被称为“东方小夜曲”,享誉海内外。高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镇)第一党支部支委、组织委员,是盐丰早期地下党员。至今,纪念馆仍收藏有高梁留下的《小河淌水》曲谱手稿。

赵祚烈士是大姚人民的骄傲。他于1903年出生在金碧镇七街仓西村。1924年考入上海同德医科大学,参加“新滇社”。1926年秋,赵祚传经王德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他回到云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4月,在王德三远赴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期间,赵祚代理省临委书记。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

常困难,赵祚传把家里寄来的生活费绝大部分都交给了组织,还3次变卖家产,为党筹集经费。1928年,赵祚传拖着重病之身,步行离开昆明回大姚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时,不幸被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在大姚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6岁。遇难的前一天,赵祚传坦荡安然地写就了饱含崇高情怀的5封遗书,这些遗书完整地保留在馆内。赵祚传在遗书中说:“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被捕了,那就要抱着临难不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为党为人民献出青春和生命”。

## 长征足迹

1936年4月,红六军团长征经过大姚,历时三天两夜途经金碧、新街、石羊、

三岔河4个乡镇40个村庄,行程近百公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6年4月18日,红六军团进入大姚境内的李湾至七街宿营。在七街仓西村休整的红军官兵在肖克和王震的带领下,瞻仰了赵祚烈士墓,并向烈士家属赠送一条毛毯,表示慰问。

4月19日天未亮,红军离开七街,经锁北、凉桥、大桥、柳树塘、土地祠等村庄,打开五井大盐仓,把30多万斤食盐分给贫苦大众,并砸开监狱大门,解救受冤被囚的群众60多人。20日拂晓,红六军团撤离盐丰,经祥云、宾川与红二军团汇合,从丽江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



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



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展厅

## 文史笔记

## 沾益州安氏土司的兴衰

□ 侯文科

土司制度在云南源远流长,从实质上来讲,汉武帝在滇池区域设立益州郡,任命滇王、赐滇王金印,就是云南土官制度的开端。之后从诸葛亮七纵孟获到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政策,都是这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演变。到元代,这种土官开始称土司并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管理、考核、赏罚制度,云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土官、土司成了其原来区域内更加合法化、编制化的实际统治者和“世拥其兵”的操控者,是巩固朝廷委派的有任期的流官对地方实施有效管理的中坚力量。

## 安氏土司的崛起

宣威在元代属鹿卢部,讹称为罗罗,到元代末期,以安举宗为头领的安姓发展成为豪族大姓。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沾益州,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3县,治州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曲靖路总管府为宣抚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改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万户以镇之”。大德七年(1303年)又将贵州普定路改归曲靖宣慰司管辖。至此,曲靖宣慰司掌管当时的曲靖路、撒江路、仁德府、普定路、普安路(今曲靖、玉溪两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及昆明市的寻甸县、贵州普定所辖大部分地区和普安)的广大区域,安举宗任宣慰使,掌军政民政,兼行都元帅府职责,是云南行省下的实权派人物之一,从此宣威安氏家族走上了土司统治的政治舞台。

元代天历年间,云南潘王秃坚不花、万户伯忽等叛乱,安举宗平叛有功,封怀远将军,加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享行省流官官衔,实际履行着对今宣威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管理。继安举宗后,至四世土司阿哥,袭封行省参知政事,后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随傅友德征大理有功,加授沾益州土知州,从此安氏世袭沾益州土知州职十八代,其政治中心就在今宣威市河东营村,延续到清初改土归流时期。在土司衙署后的马鞍山山腰处,是安氏的兵营,掌握着辖区内四十八个武装点的调动权。县志载:“土司营栅,坐石龙山,险阻四塞,介焉蜀之东,所部九十八营火,以勇健称,其众三倍于乌撒”。

从安举宗任宣慰使,到末代土知州安于善止,共436年的时间里,安氏一直统领和掌控着沾益州,其统治力量以姻亲、过继承袭等关系,在沾益州周边北起宣威市,南至富源县,东起贵州普定,西至昆明寻甸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渗透和联系。

广大土司署现仍保存其后堂建筑一栋,三开间一楼一底土木结构,坐东向西,位于石龙山(马鞍山)西麓,为清初遗留建筑,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安氏土司的没落

安氏土司对沾益州400多年的长期统治,使其区域性逐渐凸显,武装力量日益坐大,时常出现与邻境土司相互构兵或联手抗击流官执政而屡兴兵祸的情况,对区域内佃农也屡屡出现盘剥过盛和草菅人命的现象。县志载:“土官之取于民,百倍上供之数,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银数十两,终身不见天日之期”,甚至出现“其人民皆知有土官,不知有朝廷”的局面。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呈报土司对统治区域的沉重盘剥和屡兴兵灾的罪责,请求施行改土归流,得到雍正皇帝允准。恰值宣威籍举人尹治在京师候选,感于民众之无辜,上呈通政司,列举安于蕃十六条罪状:“日杀乳母于东山、日因血叔于南楼、日不父其父而称其祖……”雍正皇帝交军机处与鄂尔泰商讨并案办理,沾益州改土归流之议尘埃落定。

雍正四年(1726年),曲靖府差役到沾益州提案,依旧例,沾益州派差役人员协助。办理过程中,府役与沾益州土目发生争执,恰值安于蕃与沾益州牧张荣因他事不合生隙,张荣趁机弹劾安于蕃,请旨治其罪,正式引发沾益改土归流。鄂尔泰即檄令寻沾营游击祝希尧,将安于蕃擒拿解送行省,请旨定罪获允。同年十月,鄂尔泰令流官张荣及曲靖府通判徐德裕,清丈沾益州所辖各营区田地,次年七月,改设宣威州,自永安铺以北属沾益州,以南属宣威州。

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安于蕃被安置到江南江宁府,“招发于蕃江南江宁府安置安氏之世,以绝安氏”。至此,安氏十八代土知州统治沾益州的历史谢幕,原沾益州的核心区行政区划易名“宣威”,并沿用至今。

(作者单位:宣威市文物管理所)